“你得去看看《芭比》”

顾文艳

Michelle让我去看《芭比》。

Michelle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上回见她是2011年的暑假，我和我妈一起去她父母在纽约长岛的家玩。那是一栋很大的房子，我和我妈一人住一间客房，每天狂吃她好客的母亲做的美式巨餐。我妈比划着问她妈，在长岛买这么大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她妈也比划着回答，50万美金左右。十多年后重聚，我问她妈妈好。她说她妈很好，刚搬去马里兰，住在她生了娃的姐姐家附近，最近把长岛的房子卖了，净赚150万。

Michelle也很好，住曼哈顿上东区，在第六大道的梅西百货客户捐赠部门工作第7年，每个月交5000美金的房租，2000美金的婚姻治疗。她和她老公2020年结的婚，在疫情伊始的纽约度过了芭比粉的蜜月，在疫情的尾声遭遇了这段婚姻不可逆转的凋萎。你必须挽救你的婚姻，她妈对她说，不管用什么方式——生娃，砸钱、时间，无形有形的一切。

我受够了这一切。Michelle边说边往嘴里灌了一大口梅洛红葡。你看，什么都是我的错。我可不想生娃，我受够了。我太累了。我受够父权制了。我刚看了《芭比》。对，你得去看看《芭比》。

几天以后，我去电影院看了《芭比》。

此时又是一个地球迄今为止最热的7月，我正在康涅狄格大学带队夏令营。学生下午4点下课，我们匆匆咽下难以下咽的食堂饭菜，赶5点多的场次，去考察2023年夏季最火热的全球文化现象。我们准点入场，没穿粉色，但裹上了最厚的衣裤，哆哆嗦嗦，顽强地抵御全球最强的夏季制冷。15分钟喧闹的广告，2小时更加嚣烦的正片。最后一幕（以下开始无负担剧透），玛格特·罗比演的芭比披上清凉小西装，脚踩粉色勃肯鞋，走进现实世界，宣布自己要看妇科医生了（如图）。我们后方立即传来一阵几近粗暴的狂笑，三两声击掌；是两个严重肥胖的白人中年妇女。她俩从头笑到尾，偶尔欢呼雀跃。我冻僵了，勉强起身，走出影院，解冻，叹：烂。

美国电影《芭比》剧照

烂的原因有很多。我最受不了的烂点在于它能如此理所当然地轻故事，重说教。故事有起有落，但摇摇欲坠；戏仿、隐喻堆砌如山，叙事严重过载；剥去亮丽的粉壳，就只剩单一同构的嘲讽与游说：父权社会真糟，男性凝视真狠，权力更迭真快，妇女团结真有用，平权真难——做真正的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啊啊，亢奋的观众们都忍不住站起来为2023年还在重复的千篇一律的好莱坞成长故事鼓掌。

不过，叙事过载和说教问题，其实是近年好莱坞电影的普遍特征。看看去年的《瞬息全宇宙》和《巴比伦》就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疫情以后，喧嚣壮丽的大制作有意用斑斓的画面和高能的音效冲散这三年的死寂和恐慌，还是它们都在无意中卷入了一场与抖音的同台竞技——饱和视效、镜头拼接、时空剪辑——各种眩目花哨的手段，其核心目的是争夺观众的注意力。毕竟在这个时代，关注（不管是女性凝视还是男性凝视）就是资本，就是权力。导演们对博眼球的杂烩风并非不自知，多半是有意而为。去年那两部我也不喜欢，但《瞬息全宇宙》至少溯了点儿好玩的邪典文化，《巴比伦》芜杂负重的叙事里也空出了还算充足的阐释空间。

我对《芭比》的意见最大，因为在它看似开放自由的戏谑讽喻背后，分明升起了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启蒙话语。它的嘲讽轻松诙谐，从第一幕谐仿《2001太空漫游》开始，一路靠着机智的调侃（《教父》那段确实妙），好玩的台词，解构再解构。嘲讽解构本是自由派的最爱，也是葛鲍组合，“呢喃核”（mumblecore）忠粉擅长的电影语言机制。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一部妙语连珠、热梗无数的片子非要把所有的“解构”团结起来，拼拼凑凑，搭建一场女性主义启蒙盛典。当然，芭比主角在影片最具宣泄能量的觉醒时刻，其实已经一本正经、神采飞扬地（尽管同时也是自嘲搞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说出父权制下女性身份的认知失调，你剥夺了它的权力！”

换言之，《芭比》就是要说，要发声。不仅要把女性困局说出来，还要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一股脑儿全部倾倒出来。管它有多复杂多矛盾，管它会不会让故事超载，管那说出来的方式有多教条多肤浅！因为发声是第一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能从被“洗脑”的蒙昧中醒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能削弱父权。“父权制”一词在影片中出现了近十次，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词如此自然地跳入了Michelle和我的交谈，占据了她反思与吐槽个人婚姻状况的中心——毕竟，词频效应本身就是“洗脑”的标准认知策略。是的，我这里的意思就是，《芭比》的发声逻辑虽然成立，但它的发声方式确有“洗脑”之嫌。无论我多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我都不喜欢被洗脑。

好在，影片整体的戏谑风格和浓稠的梦幻歌舞色彩还是削减了一部分说教的刻意。同时，我其实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选择忽视，或者说原谅这部片子如此明显的教条风——在美泰工作的母亲格洛丽亚那段台词说得挺做作的，却在世界各路社交媒体被疯转，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她确实是在陈述一个全球共识：做女人可真累，外界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当然，这也是在影片第一幕就浓墨重彩地用“芭比”形象揭示的女性困境，也就是芭比所说的“女性身份的认知失调”：在原始“女人的黎明”，玩宝宝玩偶的女孩看到穿泳装的巨型芭比，义无反顾地砸毁了手里的娃娃，开始了女性的进化：从母亲到芭比，从父权规训走入男性凝视。哎，砸毁了娃，却砸不碎性别角色的铁链，这也太气人，太无奈了，吧！

因此，女人们需要宣泄。世界各地的女人都很愤怒。2022年在世界各地都是个很奇葩的年份，在美国发生的大事是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取消了人工流产的宪法保障。生育自由向来是女性主义的重大议题，也是女性身份的关键问题。如果说《芭比》开头提出的困境是母亲/芭比的认同困境，影片中间部分的闹腾里就充斥着现实世界的女性在这个困境中——在被控制的女性身体和被控制的女性身份中——寸步难移的沮丧、恐慌和愤怒。影片最后走出困境的答案烂俗老套，但确实抚慰人心，一场母亲与芭比的和解：你可以生娃，也可以不生；你可以风骚迷人，也可以看妇科医生；只要做自己，你就是芭比，无所不能。

不管怎样，Michelle没说错。《芭比》是一部烂片，但是一部得去看看的烂片。它就像那占领2023年美国夏日影院的室内冷气，充足，舒适，优越。对于在烈日下待太久的人来说，能进来吹会儿冷气实在太爽了，解暑，简直振奋人心！炎热得气人的夏天，谁不需要冷气呢？可它吹得太过了，出风口高高在上，迫使所有进入影院的人接受、享受这种宣泄性的舒适——那归根结底由过量的资源和庞大的资本堆出来的凉爽与舒适。

我给Michelle发了个消息，说我看了《芭比》，但还没想好怎么评价。她没回我，我就开始上网刷影评。观众打分两极化分明。文艺影评主要是好评，但也挺分裂的。《纽约时报》夸了夸葛导的才，批评剧本的女性主义批判太弱；《民族》周刊夸了夸葛导的才，批评剧本的女性主义批判太过。然后我又看了个葛导的采访，她在里面说，所有人都在注意芭比的踮脚，但建议大家也关注一下芭比的手——影片有个镜头，发明芭比的露丝和芭比的手碰上了。那是按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里上帝和亚当的姿势拍的，她说。

我不记得那个镜头了。我只记得芭比跟露丝的对白，以及芭比对路边老人说“你真美”的那一幕，又突兀，又矫情。我还记得以前艺术史课讲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老师说，《创造亚当》里那个飞在空中的上帝，身着的红袍形成了子宫的模样。于是我去搜了高清图。果然，上帝周围有一片极其温柔的浅红，贝壳状，像夕阳的余光。

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场景，我想。她的子宫挣扎着飞了出去，变成了上帝的红袍。

2023年7月28日星期五

范用未完成的书稿《我的创刊号》

谢其章

今年是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汪家明先生以新著《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出版家。当读了书中第四章《最后的书时光》，我想起了一部范用未完成的书稿，也许值得写出来我知道的一点儿细节，并以小文来怀念范用先生。

汪家明写道：“《存牍辑览》是范用最后编纂的书稿，没等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就去世了。这部书稿，他大约编了五年，从2005年就开始了。”我约略知道一点儿《存牍辑览》书稿的事，在范用这里似乎是2004年春已经有了成熟的具体做法。事情还要从范用给我的几封信说起。

2004年3月31日收到范用的信，信封落款是三联书店总编室，我纳闷呢，三联给我写什么信？拆开一看是范用，又惊又喜。现在应该把范用信全文抄下来：

其章先生：

前承惠赠《创刊号风景》一书，甚感。此书介绍了七十多种期刊，叙述其特点，还讲了有关的故事，娓娓细谈，很有味道。

由此想到我也存有一批旧期刊，也可写本《我的创刊号》。但要翻箱倒柜，找出这些期刊，然后一篇一篇地写，更为困难的是把这些创刊号拍摄书影。如果北图出版社还愿意印这本书，我就着手做这件工作，花年把的时间完成它。

请 先生得便时问问北图出版社。

我收藏的刊物，刊名附上。

耑上。顺颂

编安

范用

范用想写《我的创刊号》，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出版社，出版社很高兴，马上派出精干人员前往范用家拜访，我有幸跟随，时间是4月22日上午。我对范用的民国期刊收藏极有兴趣，出版社编辑却别具眼光，当下与范用商议了两个选题，藏书票和名人书信。编辑建议将范用这批信札影印出书，这样省时省力。范用不同意这个法子，他说要亲自整理，一一重新抄录之后方能出版。当时范用的身体状态已经很不好，我心想，这么多信恐怕没个四五年抄不完。中午请范用一起下楼吃个饭，范用连连摆手不去。

这是我知道的《存牍辑览》最初的一点儿情况，后来的进展我一无所知，只隐约感觉出版社似乎对范用的《我的创刊号》不热情，范用却热情不减，4月25日又写来一信：

其章先生：

我试写了两篇，如觉得可以，请寄回，我慢慢写下去。两篇稿子，烦请寄回，因未留底。

范用

四，廿五

范用写成的是《周报》和《清明》两本杂志，每篇五六百字，不妨看作简明扼要的刊物始末。我这里将范用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带创刊号的杂志名单抄录下来，两者相加也许能说明范用对于《我的创刊号》上了心，认真了。

我收藏的期刊（解放前出版）

《译文》《国民》《古今》《光明》《光明战时号外》《生活星期刊》《天地》《大众生活》（香港）《电通画报》《烽火·呐喊》《读书月报》《诗创造》《人世间》《读书与出版》《中国新诗》《野草》《新文字半月刊》《周报》《读书生活》《苏联文艺》《消息》《生活学校》《故事杂志》《集纳》《读书半月刊》《清明》《译报周刊》《文学月报》《耕耘》《民主》《学习生活》《万象》（汪子美编）《剧场艺术》《大家看》《万象》《笔谈》《萌芽》《十日杂志》《海燕》《大众生活》（上海）《时代漫画》《作家》《新生》《上海漫画》《文丛》《小说家》《漫画生活》《漫画家》《新少年》《逸经》《文萃丛刊》《大众文艺丛刊》。

以上共五十二种。以我的理解，范用挑出的这些期刊应该基本是全套整份的，范用不会像我那样拣出一本创刊号便“由此说开去”。在写就的《清明》里，范用写道：“丁聪在我的这本《清明》合订本上题词：‘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可脑子还经常怀念着这几本《清明》杂志，是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原地没有进步？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清明》出四期，合订本表明了是全份。《周报》总出五十期，从范用的行文里可以看出是手握全份的，“《周报》创刊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次年八月休刊，共出版五十期。”“在休刊号上，刊登了十五位文化界人士的《我们的控诉》”。寒舍存有《清明》四期全，《周报》有四十余期，不全，可喜的是一头一尾创刊号和休刊号在。

我还想，范用拿《清明》和《周报》打头阵，是因为他对这两本杂志的编者和作者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一九九五年（吴）祖光、丁聪、（龚）之方在我的《清明》合订本上签名留念。现在祖光、之方，都已归道山，思之怆然！”如今范用的藏书藏刊均捐献给了某公立博物馆，但愿这些承载着文化人物遗泽的图书，不要“一入侯门深似海”，该展览的展览，该出纪念图册的出图册。

此外，像《时代漫画》《漫画生活》等漫刊，范用曾借给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丛刊使用，均为全套无阙者。范用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漫画刊物情深意长，我深有领会。人们只知道范用爱书，却不知范用爱期刊不下于爱书。五十二种期刊名单里有两种《万象》杂志，其中一种《万象》后缀（汪子美），对近现代期刊史不熟悉的读者也许会忽略过去，殊不知这个汪子美（1913—2002）乃上海漫画界的名画家，抗战期间在重庆主编漫画刊物《万象》十日刊。几十年前我热衷于搜集刊名里带“万象”两字的期刊，旧书店曾给我找来六七种，其中便有汪子美这种。

范用喜欢古旧漫画杂志，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可讲。2004年8月敬收一函：

其章先生：

前承惠赠大著《创刊号风景》，日前，北图出版社曾诚又赠我《创刊号剪影》，甚喜。

顷在张阿泉《清泉》上获悉又有《漫画老杂志》一书，亟思一读，是否亦为北图出版？以便购读。烦于便中来一电话67632508。

顺颂

编安

范用

八月十五日

《创刊号剪影》也是北图出版社给我出的，《漫话老杂志》则是2000年山东友谊出版社给我出的，范用既爱漫画也爱老杂志和创刊号，因此误会成“《漫画老杂志》是否亦为北图出版？”8月21日日记：“今晚给范老去电话，说清了是‘漫话’而非‘漫画’。这样的听错非范老一人。”

我对民国期刊的了解，范用开出的这份杂志名单，以珍稀程度论应是《耕耘》《海燕》《萌芽》《文萃丛刊》《电通画报》《漫画生活》《小说家》排在前面。《耕耘》只出两期，极稀见，编者作者后来都成为范用的亲密朋友。范用与《文萃丛刊》的革命情义和生死之交，非常令人感动，这些经历范用写进书里了，我收藏有《文萃丛刊》，感受更深。《电通画报》总出十三期，非常名贵，范用写过得书经历，颇值一读。那天在范用书房他拿出全套《电通画报》给我观赏，大饱眼福。

范用一辈子做出版，为读者为师友出版了无数的好书，可是自己心爱的《我的创刊号》却未及完稿；那样的心情或许只能用抱憾来形容。

林深见鹿

来颖燕

上海的冬天常常湿冷，苦寒的日子并不多。因此，十三四岁那年的寒冬会在记忆的背包上划上一刀。快放寒假时，路过学校花园里的小池塘，水面的冰层粗粝又结实。当时我很兴奋，更显出身边同学的冷静。她说：“冰面下的水还在流淌。”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懵懂岁月里的点滴，如果能抵住时光的侵袭，就会成为今后的谶语。这或许是为什么，每年的高考季会触动大家的共情，默契地回望少年的自己。

中学时代，学校的元旦文艺汇演，是一场重要的释放和告别，高三的学长们准备的节目永远关于离别。小虎队的“放心去飞”，是最贴切的背景音乐。等到自己搬到了高三的教室，好朋友在临别留言本上写道：你这个坏东西，像一列火车，载着一车的好东西就要开走了。记忆的迷宫里，关于青春的一切，苦恼、迷茫甚至怨怼，都会是清晰而美好的存在。

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新书分享会，一个在读研究生现场提问，诉说对自己今后何去何从的迷惘。她问自己也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当时脑子里立刻蹦出弗罗斯特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人本来就是惊奇而不确定的存在，那些岔口，危机四伏，又充满无限可能，所以日子才值得过下去。

于是，弗罗斯特感叹：“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光阴制衡着我们的选择。我们必须不断地面临路口的分岔，选择其中一条，然后再往下继续选择，直至走向密林深处。林深未必能见鹿，也永远没有回头路。

我从小偏科。数感很差，语感是上帝给我开的另一扇门。但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开明的数学老师。他的普通话很不普通，经常硬性音译沪语。他会说我们要做一个“传良”（善良）的人，也会通知大家一会儿到“露梯”（楼梯）边集合。他自觉在上海滩，数学教得跟他一样好的老师有，比他教得更好的没有了。这话令身处叛逆期的我们也无从反驳。他当时写了一本专门讲解数学解题思路的书，很热销。那时坐我右手边的男生，自视甚高，但对数学老师是真心崇拜。他买了老师的书，下课又追着老师索要签名。回到座位上，他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老师的笔迹，然后工工整整画上了个框。我很诧异：这是干嘛？他解释说这是着重强调的符号，表示尊敬。我说如果老师看到会打你的，他忽然陷入了迷茫。

对于数学的绝对分值永远要低于语文和英语的我，这位教了我们七年的白发苍苍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流露过嫌弃的眼神。他会用他的“洋泾浜”跟我说，每科都优秀的学生，以后可能很难真的成功，因为真的成功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是他给我的宝贵的定心丸，给予我继续放肆偏科的勇气。

而我那刚出师范校门不久的语文老师，是沉稳老道的数学老师的参照系，只是他们的骨子里潜有同样的自信和智慧。她时髦而不羁，蹦蹦跳跳是她的走路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延展成不按常理出牌的教学方式。校长因此找过她谈话，但她依然特立独行。她预言我们以后一定会感激她，现在想来这话并不过分。她让我们意识到语文一科并非只能跟限定答案的试卷捆绑，模糊性和开放性才是它的魅力所在。于是，我们被要求隔几周读一本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罗亭》《傲慢与偏见》……这些故事从此轮回在许多个人生瞬间。她会告诉我们《呼啸山庄》要胜过《简·爱》，尽管那时的我们还是更喜欢《简·爱》那悲伤但光明的结局；初一的试卷里，她会要求我们对诗歌的平仄进行判断，尽管这完全无“纲”可依。她出的试题总是没法跟市里其他重点学校同属一个频道，却真实地让我们跟以后的大学学习生活无缝链接。她有时会召集几个学生帮她一起批改试卷，我曾是其中之一。那次期末考她出了一道题：“你能不能根据下面这段作品的风格判断作者是谁？”这样的题型，在多年后我参加中文系硕士面试时往日重现。当然，中学那次的题很少有人能写对答案，记得我看到的一份试卷上，某同学就写了一个字：“能”。我拿给语文老师看，她大笑。但是又没法下笔打叉。

语文老师会要求我们排演名著里的桥段。同样有排演任务的还有政治课。那次政治老师让我们排一场闻一多在演讲后被枪杀的戏。一位女生要演闻一多的夫人，在丈夫被枪杀后哭诉当局的暴政。她全情投入，不断拿手绢抹眼泪抽泣。但作为观众的我们那时还无法领略这个桥段的深意，反而因为她太投入了而出戏了。有人开始笑，最后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结果，我们整个班在放学后被留下反省。

这是很严重的惩戒。因为我们学校总是下午三点就放学，即使是在高三那样紧张的岁月里。我们总是被要求早早回家，各干各的。于是，在台下下苦功成了我们学校的传统，但因为没有硬性的要求，一切全凭自己的兴致和精力，所以在高三之前，我们都无知无畏地飞扬着。放学后，会结伴去学校外的小街音像店里淘9块9的卡带，伴着满大街飘荡的张学友的《吻别》或是彭羚的《囚鸟》，把自行车踩得飞快……那年的《戏说乾隆》令同桌着迷以至于在化学课上收集实验中析出的盐粒，说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建个盐帮……

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说：“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乃是那同时萦绕着我们的记忆与感觉这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往事的重现，必须有非属记忆作用的其他事物的出现，比如味觉、触觉、听觉（博尔赫斯语）。这乱糟糟的一切，让整个青春的记忆毛茸茸的，仿佛是个清醒的梦。直到面临高考需要文理分班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选择题开始一道道横在我们面前。记忆里，从那一刻开始，空气变得凛冽。联考前，以前爱吹萨克斯风的男生在头上绑上交通大学字样的条幅，手握三支铅笔，向东方拜了三拜。他说这是祈福。他后来果然如愿进了心仪的学校。我想，嗯，迷信就是痴迷地相信，看来心诚很要紧。

心诚是因为大家终于开始明确自己的方向。

至于我自己，终于做了逃兵，因为当年有可以提前报考某些高校文科基地班的机会，我想来想去，跷脚多年，还是认清现实，皈依了早就认定的专业吧。隔壁班的数学老师在走廊上遇到我，认真地鼓励我说：“其实你可以再努力一下去高考，努力一下，你的数学可以从110分进步到120分，从120分进步到130分，最高进步到150分。”（当时高考一门主课的满分是150）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是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做对了那一刻的人生选择题。或许多年后回望，才能走出局限有所领悟。但是“多年”到底是多少年呢？对于无法踏上的另一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永远葆有着好奇和遗憾。

记得中学时代的体育课，有一个特别让人恐惧的项目——越野跑。要越过我们自己的校门口，然后穿行到隔壁的大学校园，再绕回来。漫漫长路，如果认真对待，真的是魔鬼训练。但好在没有体育老师全程陪跑，他只是在终点等我们。这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活动”空间。在屡次试错后，我们发现了一堵墙，翻过去，就可以抄一半的近路，足以在另一半的路途上悠悠荡荡，然后体面地抵达终点。很快，其他班的同学也发现了这条被一堵墙遮蔽的近道。很快，因为翻的人太多，墙塌了。再后来，凡是涉事的，都被教导主任叫去了办公室……

但我知道，那时的我们不曾后悔，只是暗地还想要怎样再辟蹊径。这生猛的青春，值得我们用余生致敬——它是在面临密林中的一道道岔口时，即使周围沸反盈天，也会任性，会不问东西的存在。林深见鹿，原来那头鹿，正是我们自己。